

# 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 基于 CNI 模型的分析\*

云 祥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管理学院, 南京 210023)

**摘 要** 采用道德困境判断的 CNI (consequence, norm, inaction) 模型, 通过两个实验考察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实验 1 探讨个人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 结果显示高个人权力感显著增加被试对规则的敏感, 促使个体做出道义论的道德判断。实验 2 考察回忆任务启动的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 发现相对于低权力感启动的被试, 高权力感启动的被试在进行判断时更关注行为的结果, 对规则更不敏感, 这说明启动的权力感促进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 抑制道义论的道德判断。结果表明, 不同类型的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存在差异。

**关键词** 个人权力感, 权力感启动, 道德困境判断, CNI 模型。

**分类号** B849

## 1 引言

道德判断是指个体依据一定的标准, 对某些行为的是非好坏进行评价, 并做出选择和判断 (Cohen & Ahn, 2016)。根据道德判断的依据, 个体将道德判断分为道义论的道德判断和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 (喻丰, 彭凯平, 韩婷婷, 柴方圆, 柏阳, 2011)。道义论道德判断强调根据道德原则进行判断, 如果行为本身违背道德原则, 即便该行为能够给个体带来更大的福祉, 也不可接受; 功利主义道德判断根据行为结果判断, 如果某个伤害行为能给个体带来更大福祉, 其在道德上就可接受。Greene (2007) 的道德判断双加工模型 (dual-process model) 认为不同倾向的道德判断依赖于不同的加工过程, 道义论判断取决于自动的情绪反应, 而功利主义判断依赖于审慎的认知加工, 道德困境判断反映了对伤害的直觉情绪反应与对结果的审慎认知之间的冲突。另外, 研究者发现, 其他因素也会影响个体做出道义论或功利主义道德判断, 如性别 (Gawronski, Armstrong, Conway, Friesdorf, & Hütter, 2017)、年龄 (McNair, Okan, Hadjichristidis, & de Bruin, 2019)、文化 (Graham, Meindl, Beall, Johnson, & Zhang, 2016)、语言

(Bialek, Paruzel-Czachura, & Gawronski, 2019)、情绪 (Gawronski, Conway, Armstrong, Friesdorf, & Hütter, 2018), 以及认知负载 (Gawronski et al., 2017) 等。权力是影响个体心理和行为的重要变量, 拥有权力和地位的个体时常需要做出影响众人的道德判断和决策, 因此厘清权力如何塑造个体的道德判断尤为重要。

近年来, 权力与道德判断的关系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李小平, 杨晟宇, 李梦遥, 2012; Fleischmann, Lammers, Conway, & Galinsky, 2019; Lammers & Stapel, 2009; Lucas & Galinsky, 2015)。但是这些研究得出了互相矛盾的结果, 一些研究显示权力会增加道义论判断 (李小平等, 2012; Lammers & Stapel, 2009), 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权力会促进功利主义判断 (Lucas & Galinsky, 2015)。尽管后者没有提供直接证据, 然而有研究显示高社会阶层 (Côté, Piff, & Willer, 2013)、睾酮 (Carney & Mason, 2010) 等与权力相关的因素会增加功利主义道德判断。Fleischmann 等 (2019) 认为上述矛盾的结果源于两方面原因: 一是道义论和功利主义并非彼此对立; 二是个体的四种道德思维取向 (整合取向、审慎取向、规则取向和情感取向) 共同影响道德判断, 而权力对这四种取向分别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 进而导致权力和

收稿日期: 2020-03-15

\*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2017SJB0535)。

通讯作者: 云 祥, E-mail: yunx@nfpc.edu.cn。

道德判断的关系也较为复杂。

上述研究多采用传统的道德困境范式，而传统的道德困境范式对道德困境判断结果的解释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其将道义论倾向和功利主义倾向视为对立的两极，而这与 Greene (2007) 的道德判断双加工模型相违背，该模型认为道义论倾向和功利主义倾向基于两个独立的加工过程，并非彼此对立 (Conway & Gawronski, 2013; Gawronski et al., 2017)；第二，传统道德困境范式在结果上混淆了其他变量 (Gawronski et al., 2017)，如传统

研究中判断为功利主义的结果混淆了个体的一般行动倾向 (general preference for action)，而判断为道义论的结果混淆了一般不行动倾向 (general preference for inaction)。Conway 和 Gawronski 提出采用过程分离模型 (process dissociation analysis, PD) 来量化功利主义和道义倾向的相对强度，以解决传统范式中的第一个问题，但仍然没有解决结果混淆问题。Gawronski 等进一步提出了包含结果、规范和一般反应倾向的 CNI 模型 (见图 1) 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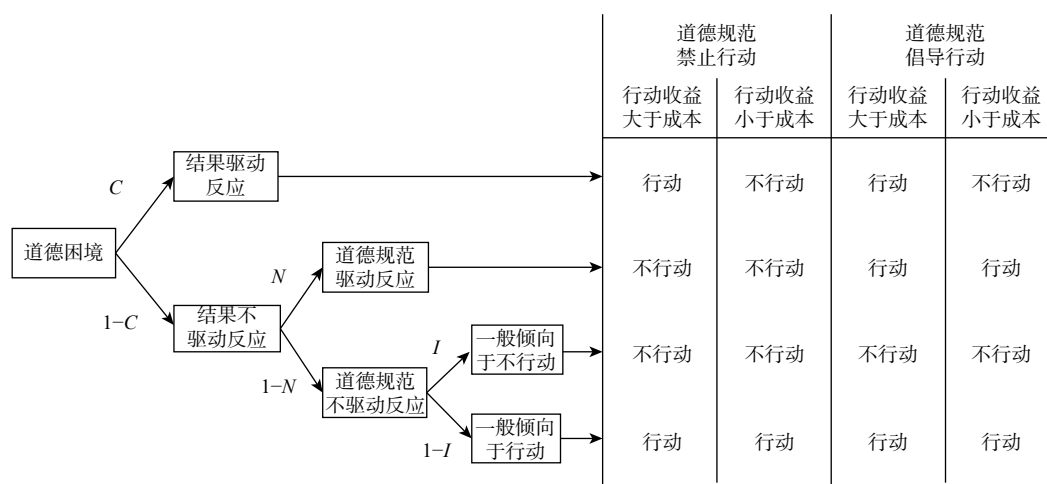


图 1 CNI 模型图解

在 CNI 模型中，研究者认为道德判断由三个潜在的心理过程共同驱动：功利主义倾向、道义论倾向和个体自身反应倾向，并分别用结果驱动的反应 ( $C$  参数)、道德规范驱动的反应 ( $N$  参数) 和个体自身的反应倾向 ( $I$  参数) 来表征。为验证 CNI 模型能否有效分离道德困境判断中潜在的心理过程，Gawronski 等 (2017) 设计了 6 种道德两难情境，每种情境包括行为结果（收益大于、小于成本） $\times$  道德规则（禁止、倡导行动）4 个版本。根据被试对 24 种道德情境的反应，研究者利用多项式建模 (Hütter & Klauer, 2016) 估计反映道德判断潜在心理过程的  $C$  参数、 $N$  参数和  $I$  参数。研究表明，CNI 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被试判断时的心理过程，为进一步分析道德判断心理机制提供良好的模型框架 (Gawronski et al., 2017)。本研究将使用 CNI 模型探索权力与道德判断的关系，以进一步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

从已有的权力对心理和行为影响的研究结果来看，权力可能对  $C$  参数、 $N$  参数和  $I$  参数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进而导致权力与道德判断呈现较

为复杂的关系。具体阐述如下。

$C$  参数表征对结果的敏感。根据 Greene (2007) 的道德判断双加工模型，对结果的敏感是个体对行动成本和收益审慎认知的结果，而权力会使个体更关注情境目标 (Guinote, 2017)，促使个体充分处理信息 (Scholl & Sassenberg, 2014; Smith & Trope, 2006)。因此权力可能使个体倾向于基于务实而不是基于情绪反应做出决策 (Agerström & Björklund, 2013)。另外，根据权力社会距离理论 (Magee & Smith, 2013)，权力会增加个体与对象的心理距离，提高对情境的解释水平，导致功利主义道德判断 (Aguilar, Brussino, & Fernández-Dols, 2013)。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假设权力会提高  $C$  参数。

$N$  参数表征对规范的敏感。而根据权力心理效应，权力对  $N$  参数的影响可能较为复杂。一方面，权力可能会增加个体的道义论倾向。高权力者有着更高的维持地位稳定和安全的需要，而规则有助于维持权力等级的稳定，因此高权力者更关注规则以保障权力和地位 (Lammers & Stapel,

2009)。同时,权力可能会导致应用启发式道德规则的思维模式,因为权力与信息的启发式处理有关(Guinoite & Phillips, 2010)。另一方面,权力也可能会减少道义论倾向。研究发现权力使个体不易受规则约束(Galinsky, Magee, Gruenfeld, Whitson, & Liljenquist, 2008),这意味着权力会导致个体不在乎规则,降低其对道德规范的遵守。基于上述矛盾的结果,本研究难以预测权力对 $N$ 参数的影响方向。

$I$ 参数表征的是在对道德困境做出选择时,不依赖结果和规则,只基于个体自身的反应倾向。如果个体偏好不行动,则无论规则和结果,都不行动;如果个体偏好行动,则无论规则和结果,都行动。而权力会激活个体的趋近系统(Keltner, Gruenfeld, & Anderson, 2003),导致个体更强的行动偏好,因此本研究假设权力会减小 $I$ 参数,使得个体在道德困境判断中更倾向于行动。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采用CNI模型考察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具体来说,通过问卷测量个人权力感和回忆任务启动权力感状态,分别考察个人权力感和权力感状态对道德困境判断中 $C$ 参数、 $N$ 参数和 $I$ 参数的影响。

## 2 实验1:个人权力感与道德困境判断

### 2.1 研究方法

#### 2.1.1 被试

选取南京三所高校的363名在校大学生作为被试。因31名被试未通过注意检查任务,最终样本量为332名(女生98名),平均年龄19.93岁( $SD=1.33$ 岁)。

#### 2.1.2 研究工具

##### (1) 个人权力感量表

采用Anderson, John和Keltner(2012)编制的权力感量表(Personal Sense of Power Scale),包括8道题目,7点计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80。

##### (2) 道德困境判断材料

道德两难情境采用Gawronski等(2017)的实验材料,由6种道德两难困境构成,每种困境包括4个不同版本,共有24种道德两难情境,以固定的随机顺序排列。每种道德困境都要求被试判断困境中主体的行为是否可以接受(不可接受、可以接受)。

##### (3) 注意检查任务

注意检查任务用来检查被试在进行判断前是否认真阅读了道德困境故事(Oppenheimer, Meyvis, & Davidenko, 2009)。该任务由1个项目构成,项目要求被试从3个选项中选择指定的选项,如果未按要求选择,则表示未通过注意检查任务。

#### 2.1.3 数据分析

CNI模型主要基于多项式加工树模型(multinomial processing tree, MPT)的原理构建。构建好道德判断的CNI模型后,根据被试的行为数据对模型进行拟合,并估计出3个潜在心理过程的概率。用拟合优度统计量 $G^2$ 来表示模型和数据的匹配度, $G^2$ 值不显著( $p>0.05$ )说明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G^2$ 值显著( $p<0.05$ )则说明模型和数据不能很好拟合,模型可能需要调整。所估计出的3个潜在心理过程的概率分别用 $C$ 参数、 $N$ 参数和 $I$ 参数表示,根据估计值的95%置信区间,判断3个参数是否显著( $C$ 参数和 $N$ 参数的95%置信区间是否包含0, $I$ 参数的95%置信区间是否包含0.5)。如果显著,表明在道德判断中相应的心理过程显著影响道德判断的结果。在比较不同组别被试的参数时,用 $\Delta G^2$ 表示不同组数据模型拟合上的差异, $\Delta G^2$ 值显著( $p<0.05$ ),则说明不同组被试之间的参数存在显著差异。

对于每一种道德两难情境,选择“不可接受”赋值为0,选择“可以接受”赋值为1。CNI分析的软件为multiTree(Moshagen, 2010),multiTree模板文件由Gawronski等(2017)在文章的补充材料中提供。其他数据分析由SPSS20.0完成。

#### 2.2 结果与分析

在不考虑权力感分组的情况下,使用multiTree软件分析收集的数据与CNI模型的拟合度,结果显示 $G^2(1)=1.94$ , $p>0.05$ ,说明模型拟合很好。被试总体CNI模型各参数估计值见表1, $C$ 参数和 $N$ 参数都显著大于0,表明被试在道德困境中反应既对结果敏感,也对规则敏感,其中 $C$ 参数 $\Delta G^2(1)=322.59$ , $p<0.001$ ;  $N$ 参数 $\Delta G^2(1)=790.39$ , $p<0.001$ 。 $I$ 参数与中性参考值0.5相比,差异接近显著, $\Delta G^2(1)=3.24$ , $p=0.072$ ,表明在对道德困境的反应中,被试更偏好行动。

当考虑高低个人权力感分组时,本研究采用中位数分割法(Iacobucci, Posavac, Kardes, Schneider, & Popovich, 2015),根据被试个人权力感得分,将高于中位数(4.50)的被试归入高权力感组( $M_{\text{权力感}}=$

5.24,  $SD=0.50$ ,  $n=156$ ), 小于等于中位数的被试归为低权力感组 ( $M_{\text{权力感}}=3.92$ ,  $SD=0.51$ ,  $n=176$ ), 分组数据和 CNI 模型的拟合良好,  $G^2(2)=2.08$ ,  $p>0.05$ 。不同组别被试的 CNI 参数估计值见表 1 和图 2。两组被试在 C 参数上差异不显著,  $\Delta G^2(1)=0.44$ ,  $p>0.05$ ; 在 N 参数上差异显著, 高权力感组显著高

于低权力感组,  $\Delta G^2(1)=11.16$ ,  $p<0.001$ , 说明高权力感被试在道德判断时, 对规则更敏感; 在 I 参数上差异不显著,  $\Delta G^2(1)=1.43$ ,  $p>0.05$ 。以上结果表明, 高个人权力感导致个体道德两难判断时对规则更敏感, 而对结果取向和个体自身反应倾向的影响不显著。

表 1 不同个人权力感分组被试的 CNI 参数和置信区间

组别	C 参数		N 参数		I 参数	
	M	95%CI	M	95%CI	M	95%CI
总体 ( $n=332$ )	0.19	[0.17, 0.21]	0.38	[0.35, 0.40]	0.48	[0.46, 0.50]
高个人权力感 ( $n=156$ )	0.18	[0.15, 0.21]	0.42	[0.39, 0.46]	0.50	[0.46, 0.53]
低个人权力感 ( $n=176$ )	0.20	[0.17, 0.23]	0.34	[0.30, 0.37]	0.47	[0.44, 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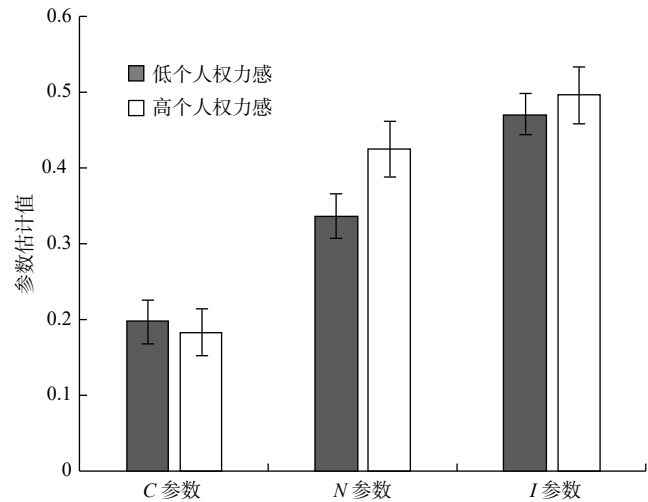


图 2 不同个人权力感组在 CNI 模型参数上的差异

3 实验 2：权力感启动与道德困境判断

3.1 研究方法

3.1.1 被试

选取南京某高校在校大学生 145 名作为被试, 随机分配到高权力感启动组和低权力感启动组。剔除 3 名未按要求完成权力感启动任务的和 15 名未通过注意检查任务的被试, 最终样本为 127 名 (女生 63 名), 平均年龄 18.74 岁 ( $SD=0.85$  岁)。

3.1.2 实验材料

(1) 权力感启动材料

权力感启动采用情境回忆任务 (Galinsky et al., 2008)。该方法要求被试写一篇 200 字左右的短文, 高权力启动组要求回忆生活中经历过的能够

控制或评价他人的情境, 低权力启动组要求回忆生活中曾经被别人控制、管理或有求于别人的情境。

(2) 启动效果检测任务

权力感启动效果检测任务包含 4 个项目, 如“此时, 我觉得自己很重要”等 (Lammers & Stapel, 2011)。另外, 为排除权力感启动引发的情绪变化的潜在影响, 还要求被试回答 2 个有关自己当前情绪状态的问题, 如“此时, 感觉很开心”等。让被试根据自己的情况在 7 点评分上对上述 6 个项目做出反应。实验 2 中权力感启动检测问卷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78, 情绪状态问卷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70。

(3) 道德困境材料

同实验 1。

(4) 注意检查任务

同实验 1。



### 3.1.3 实验程序

被试先完成情境回忆任务,接着完成启动效果检测任务,最后完成道德困境判断和注意检查任务。

## 3.2 结果与分析

### 3.2.1 启动效果检测

经检验高、低权力感启动组 ( $M_{\text{高}}=4.17\pm1.26$ ,  $M_{\text{低}}=3.51\pm1.16$ ) 在权力感检测任务上得分上差异显著 ( $t=2.76$ ,  $p<0.01$ ,  $d=0.49$ ), 说明权力感启动有效。在情绪状态上得分 ( $M_{\text{高}}=4.95\pm1.25$ ,  $M_{\text{低}}=4.70\pm1.46$ ) 差异不显著,  $t(125)=1.06$ ,  $p>0.05$ ,  $d=0.18$ , 可以排除权力感启动会通过情绪影响道德困境判断。

### 3.2.2 CNI 模型分析

在不考虑权力分组的情况下, 使用 multiTree 软件分析收集的数据与 CNI 模型的拟合度, 结果显示  $G^2(1)=2.18$ ,  $p>0.05$ , 说明模型拟合很好。被试总体 CNI 模型各参数估计值见表 1。C 参数和 N 参数都显著大于 0, 表明被试在道德困境中的反

应既对结果敏感, 也对规则敏感, 其中 C 参数  $\Delta G^2(1)=175.83$ ,  $p<0.001$ ; N 参数  $\Delta G^2(1)=416.39$ ,  $p<0.001$ 。I 参数与中性参考值 0.5 相比, 差异不显著,  $\Delta G^2(1)=1.13$ ,  $p>0.05$ , 表明总体被试在对道德困境的反应中, 行动倾向和不行动倾向的分布相同。

当考虑高低权力感分组时, 收集的数据和 CNI 模型的拟合良好,  $G^2(2)=2.40$ ,  $p>0.05$ 。不同启动组被试的 CNI 参数估计值见表 2 和图 3。高权力感启动组在 C 参数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低权力感启动组,  $\Delta G^2(1)=3.85$ ,  $p<0.05$ ; 两组被试在 N 参数上得分差异处于边缘显著, 低权力感启动组在 N 参数上的得分高于高权力感启动组,  $\Delta G^2(1)=3.06$ ,  $p=0.08$ ; 在 I 参数上得分差异不显著,  $\Delta G^2(1)=0.40$ ,  $p>0.05$ 。以上结果表明, 权力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体现在权力影响了个体对结果的敏感和对规则的敏感。具体来说, 权力感提高个体对结果的敏感, 促使被试做出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 降低个体对规则的敏感, 抑制被试做出道义论的道德判断, 但权力感对个体的一般行动倾向未产生显著影响。

表 2 不同权力感启动组被试的 CNI 参数和置信区间

组别	C 参数		N 参数		I 参数	
	M	95%CI	M	95%CI	M	95%CI
总体 ( $n=127$ )	0.22	[0.19, 0.26]	0.46	[0.42, 0.50]	0.48	[0.48, 0.56]
高权力启动 ( $n=63$ )	0.26	[0.21, 0.30]	0.42	[0.36, 0.48]	0.51	[0.46, 0.56]
低权力启动 ( $n=64$ )	0.20	[0.15, 0.24]	0.49	[0.44, 0.55]	0.53	[0.48, 0.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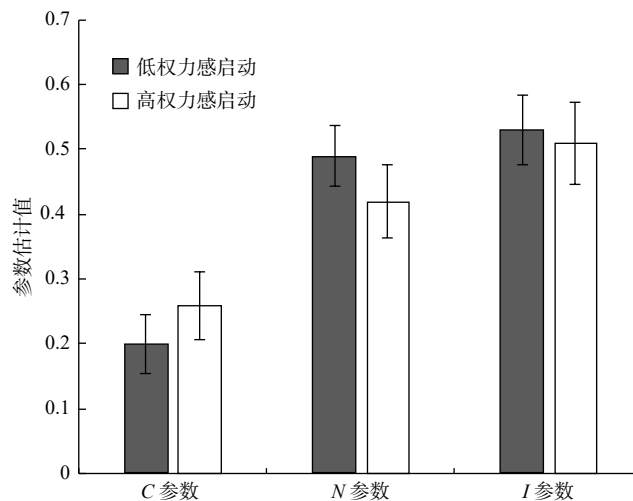


图 3 不同权力感启动组在 CNI 模型参数上的差异

## 4 讨论

本研究主要探讨权力感对道德两难判断的影

响。基于 CNI 模型, 本研究特别关注权力感是否会通过影响 C、N 和 I 参数来影响道德两难判断。通过两个实验发现, 权力感对道德两难判断的 C、

$N$ 、 $I$  参数存在影响，但个人权力感和启动的权力感在对  $C$ 、 $N$ 、 $I$  参数影响的方向上存在差异。

实验 1 发现高个人权力感增加了  $N$  参数，促使个体做出道义论的道德判断。该结果与 Lammers 和 Stapel (2009) 的研究一致，验证了权力导致个体通过关注规则来维系自身权力地位的观点。但实验 1 也显示个人权力感对  $C$  参数未产生显著影响，未能验证权力会促进个体对结果的关注，提高  $C$  参数的假设。同样，实验 1 也未发现个人权力感对  $I$  参数的显著影响，未能验证权力会激活个体的行为趋近系统，进而会促进个体道德判断中行动倾向的假设。

与实验 1 相反，实验 2 发现启动的权力感增加了  $C$  参数，促进个体功利主义倾向的道德判断，该结果验证了假设，且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Carney & Mason, 2010; Côté et al., 2013; Lucas & Galinsky, 2015)。实验 2 还显示，启动的权力感降低了  $N$  参数，抑制了个体的道义论倾向，该结果与实验 1 相反，但与认为权力会导致个体不易受社会规范影响，从而减少遵守道德规范的观点 (Galinsky et al., 2008) 相一致。在对  $I$  参数的影响上，实验 2 与实验 1 结果一致，未发现启动的权力感对个体反应倾向的显著影响。

本研究还发现个人权力感与启动的权力感对道德两难判断的影响不一致。个人权力感促进个体对道德规范的关注，增加个体做出道义论道德判断；而启动的权力感则促进个体对结果的关注，减少对规范的关注，增加个体做出功利主义道德判断的可能性。在研究初期，本研究推测个人权力感和启动的权力感对道德判断的影响效应一致，而结果并非如此。该结果说明不同类型的权力（个人权力感、权力感状态）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存在差异，这与部分研究认为个人权力感和启动的权力感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影响一致的结果 (Fast, Sivanathan, Mayer, & Galinsky, 2012; Lammers & Stapel, 2011) 相冲突，但与近来认为结构权力与心理权力可能存在不同心理效应的权力研究相吻合 (Smith & Hofmann, 2016; Tost & Johnson, 2019)。虽然 Anderson 等 (2012) 在提出个人权力感的概念时强调其心理属性，但由于个人权力感与社会经济地位有较强的相关，个人权力感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从这个角度来看，高个人权力感个体可能因其相对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在道德两难判断中更关注规则，以维护自身的地位。相比之下，启动的

权力感则主要体现为心理权力。而心理权力更可能通过心理距离影响道德判断 (Magee & Smith, 2013)，即心理权力通过增加心理距离，一方面提高个体的抽象认知和解释水平，促进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 (Aguilar et al., 2013)；另一方面减少个体对违反规则的担忧，抑制对规则的敏感 (Galinsky et al., 2008)，减少道义论的道德判断。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使用 CNI 模型更清晰地展现了权力对道德两难判断背后心理过程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厘清权力与道德两难判断的复杂关系，并为其潜在的机制提供新的见解，进一步拓展权力与道德判断关系的研究。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是研究所使用的道德两难情境直接翻译自 Gawronski 等 (2017) 的研究提供的材料，所涉及的某些道德事件未必能够有效引发中国被试的两难选择，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设计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道德困境材料。二是涉及到 CNI 模型本身的缺陷，基于 6 种困境类型和 24 种困境情境的 CNI 模型，利用 multiTree 只能有效估计出群体水平的 CNI 参数，而无法有效地估计出每名被试的参数，这导致所得的数据无法用于相关型的研究设计。三是本研究虽然给出了关于个人权力感与启动的权力感对道德两难判断的影响存在差异的可能解释，但该解释并不能通过本研究得到证明，这也需要进一步研究进行验证。

##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道德困境判断的 CNI 模型来考察权力与道德判断的关系，得到如下结论：(1) 个人权力感导致个体更关注道德规则，促使其做出道义论道德判断；(2) 启动的权力感导致个体关注结果，忽视规则，促使其做出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

## 参 考 文 献

- 李小平, 杨晨宇, 李梦遥. (2012). 权威人格与权力感对道德思维方式的影  
响. *心理学报*, 44(7), 964–971.
- 喻丰, 彭凯平, 韩婷婷, 柴方圆, 柏阳. (2011). 道德困境之困境——情与理  
的辩证. *心理科学进展*, 19(11), 1702–1712.
- Agerström, J., & Björklund, F. (2013). Why people with an eye toward the  
future are more moral: The role of abstract thinking.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5(4), 373–381, doi: 10.1080/01973533.2013.  
803967.
- Aguilar, P., Brussino, S., & Fernández-Dols, J. M. (2013). Psychological

- distance increases uncompromising consequentialis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9(3), 449–452, doi: [10.1016/j.jesp.2013.01.002](https://doi.org/10.1016/j.jesp.2013.01.002).
- Anderson, C., John, O. P., & Keltner, D. (2012). The personal sense of pow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0(2), 313–344, doi: [10.1111/j.1467-6494.2011.00734.x](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2011.00734.x).
- Bialek, M., Paruzel-Czachura, M., & Gawronski, B. (2019). Foreign language effects on moral dilemma judgments: An analysis using the CNI mode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85, 103855, doi: [10.1016/j.jesp.2019.103855](https://doi.org/10.1016/j.jesp.2019.103855).
- Carney, D. R., & Mason, M. F. (2010). Decision making and testosterone: When the ends justify the mea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4), 668–671, doi: [10.1016/j.jesp.2010.02.003](https://doi.org/10.1016/j.jesp.2010.02.003).
- Cohen, D. J., & Ahn, M. (2016). A subjective utilitarian theory of moral judg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5(10), 1359–1381, doi: [10.1037/xge0000210](https://doi.org/10.1037/xge0000210).
- Conway, P., & Gawronski, B. (2013). Deontological and utilitarian inclinations in moral decision making: A process dissociation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2), 216–235, doi: [10.1037/a0031021](https://doi.org/10.1037/a0031021).
- Côté, S., Piff, P. K., & Willer, R. (2013). For whom do the ends justify the means? Social class and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3), 490–503, doi: [10.1037/a0030931](https://doi.org/10.1037/a0030931).
- Fast, N. J., Sivanathan, N., Mayer, N. D., & Galinsky, A. D. (2012). Power and overconfident decision-mak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17(2), 249–260, doi: [10.1016/j.obhdp.2011.11.009](https://doi.org/10.1016/j.obhdp.2011.11.009).
- Fleischmann, A., Lammers, J., Conway, P., & Galinsky, A. D. (2019). Paradoxical effects of power on moral thinking: Why power both increases and decreases deontological and utilitarian moral decision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0(1), 110–120, doi: [10.1177/1948550617744022](https://doi.org/10.1177/1948550617744022).
- Galinsky, A. D., Magee, J. C., Gruenfeld, D. H., Whitson, J. A., & Liljenquist, K. A. (2008). Power reduces the press of the situation: Implications for creativity, conformity, and disson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6), 1450–1466, doi: [10.1037/a0012633](https://doi.org/10.1037/a0012633).
- Gawronski, B., Armstrong, J., Conway, P., Friesdorf, R., & Hütter, M. (2017). Consequences, norms, and generalized inaction in moral dilemmas: The CNI model of moral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3(3), 343–376, doi: [10.1037/pspa0000086](https://doi.org/10.1037/pspa0000086).
- Gawronski, B., Conway, P., Armstrong, J., Friesdorf, R., & Hütter, M. (2018). Effects of incidental emotions on moral dilemma judgments: An analysis using the CNI model. *Emotion*, 18(7), 989–1008, doi: [10.1037/emo0000399](https://doi.org/10.1037/emo0000399).
- Graham, J., Meindl, P., Beall, E., Johnson, K. M., & Zhang, L. (2016).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moral judgment and behavior, across and within societie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8, 125–130, doi: [10.1016/j.copsyc.2015.09.007](https://doi.org/10.1016/j.copsyc.2015.09.007).
- Greene, J. D. (2007). Why are VMPFC patients more utilitarian? A dual-process theory of moral judgment explain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1(8), 322–323, doi: [10.1016/j.tics.2007.06.004](https://doi.org/10.1016/j.tics.2007.06.004).
- Guinote, A. (2017). How power affects people: Activating, wanting, and goal seek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8, 353–381, doi: [10.1146/annurev-psych-010416-044153](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010416-044153).
- Guinote, A., & Phillips, A. (2010). Power can increase stereotyping: Evidence from managers and subordinates in the hotel industry. *Social Psychology*, 41(1), 3–9, doi: [10.1027/1864-9335/a000002](https://doi.org/10.1027/1864-9335/a000002).
- Hütter, M., & Klauer, K. C. (2016). Applying processing trees in social psychology.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27(1), 116–159, doi: [10.1080/10463283.2016.1212966](https://doi.org/10.1080/10463283.2016.1212966).
- Iacobucci, D., Posavac, S. S., Kardes, F. R., Schneider, M., & Popovich, D. L. (2015). The median split: Robust, refined, and revived.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5(4), 690–704, doi: [10.1016/j.jcps.2015.06.014](https://doi.org/10.1016/j.jcps.2015.06.014).
- Keltner, D., Gruenfeld, D. H., & Anderson, C. (2003). Power, approach, and inhib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10(2), 265–284, doi: [10.1037/0033-295X.110.2.265](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110.2.265).
- Lammers, J., & Stapel, D. A. (2009). How power influences moral thin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2), 279–289, doi: [10.1037/a0015437](https://doi.org/10.1037/a0015437).
- Lammers, J., & Stapel, D. A. (2011). Power increases dehumanization.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4(1), 113–126.
- Lucas, B. J., & Galinsky, A. D. (2015). Is utilitarianism risky? How the same antecedents and mechanism produce both utilitarian and risky choice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4), 541–548, doi: [10.1177/1745691615583130](https://doi.org/10.1177/1745691615583130).
- Magee, J. C., & Smith, P. K. (2013). The social distance theory of powe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7(2), 158–186, doi: [10.1177/1088868312472732](https://doi.org/10.1177/1088868312472732).
- McNair, S., Okan, Y., Hadjichristidis, C., & de Bruin, W. B. (2019). Age differences in moral judgment: Older adults are more deontological than younger adult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32(1), 47–60, doi: [10.1002/bdm.2086](https://doi.org/10.1002/bdm.2086).
- Moshagen, M. (2010). MultiTree: A computer program for the analysis of multinomial processing tree model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 42(1), 42–54, doi: [10.3758/BRM.42.1.42](https://doi.org/10.3758/BRM.42.1.42).
- Oppenheimer, D. M., Meyvis, T., & Davidenko, N. (2009). Instructional manipulation checks: Detecting satisficing to increase statistical powe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4), 867–872, doi: [10.1016/j.jesp.2009.03.009](https://doi.org/10.1016/j.jesp.2009.03.009).
- Scholl, A., & Sassenberg, K. (2014). Where could we stand if I had...? How social power impacts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after failur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3, 51–61, doi: [10.1016/j.jesp.2014.02.005](https://doi.org/10.1016/j.jesp.2014.02.005).
- Smith, P. K., & Hofmann, W. (2016). Power in everyday lif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3(36), 10043–10048, doi: [10.1073/pnas.1604820113](https://doi.org/10.1073/pnas.1604820113).
- Smith, P. K., & Trope, Y. (2006). You focus on the forest when you're in charge of the trees: Power priming and abstrac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0(4), 578–596, doi: [10.1037/0022-3514.90.4.578](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90.4.578).
- Tost, L. P., & Johnson, H. H. (2019). The prosocial side of power: How structural power over subordinates can promo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52, 25–46, doi: [10.1016/j.obhdp.2019.04.004](https://doi.org/10.1016/j.obhdp.2019.04.004).

## The Effect of Power on Moral Dilemma Judgment: An Exploration with the CNI Model

YUN Xiang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Nanjing Forest Police College, Nanjing 210023)

### Abstract

Two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power on moral dilemma judgments by using the CNI model. Experiment 1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the personal sense of power on moral dilemma judgm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igh personal power sens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sensitivity to moral norms, and thus promoted deontological moral judgments. Experiment 2 examined the effect of the priming power on the moral dilemma judgments. It was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participants with low power priming, those with high power priming displayed increased sensitivity to consequences and reduced sensitivity to moral norms. This suggested that power priming promoted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s and inhibited deontological moral judgments.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power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moral dilemmas judgments.

**Key words** personal sense of power, power priming, moral dilemma judgment, CNI model.